

大河之北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长城篇(下)

(上接第十版)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岁月的磨砺、风雨的侵蚀、战争的洗礼,加之人为的破坏,保存现状“较差”“差”“已消失”的长城点段,占总数的近七成。

“如今,像1984年那样的大规模长城修复已经没有了,现在对长城的维修主要是针对长城段落的不同险情进行精准维修。”孟琦说。

2018年,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一期)开工仪式在宽城满族自治县举行。“这是使用社会募集资金进行的长城保护项目。”孟琦介绍,该工程一期有17.4万人参与募捐,筹款281万余元,已维修长城132米,敌楼1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二期工程,将维修长城敌楼3个、墙体873米。

平滑如镜的水面容易给人误判,实际上,这里的很多山险如今都已淹没在水下。长城在燕山南麓依山势迂回蜿蜒,时而刺向峰顶,时而跌入山谷没人水中。

孟琦带着记者上山,“这里是水库中间,货车、塔吊均无用武之地,修缮所需砖头、石条都是用船一点一点运进来的。然后再由工人往上背,最后通过缆绳、滑道把材料运送至施工地点。”

潘家口段长城的主要问题是水侵蚀。

“由于水浪的横向掏蚀和正面冲击,造成水下长城墙体的结构和整体稳定性严重破坏。”孟琦指

着一段墙体说,水的浸泡冲刷使条石基础侧滑变形,灰浆失效,墙面砖风化酥碱和剥落严重。酥碱是夯土结构长城的大问题,水库区域内的长城遇到的问题更大。

“‘隆庆□□年□□造’,字迹有些不清楚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文字砖。”孟琦指着被砌回长城墙体的一块砖向记者解释,“这些文字砖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段长城是哪年由哪些人建造的,一目了然。很多这样的细微历史信息隐藏在长城上,也将通过我们的修复继续留给后人。”

孟琦向记者说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年在秦皇岛一段极度险峻的长城段落调查时,“在那种多少年人迹罕至的长城边上一脚踩下去,就能感觉到脚下绝对是以前有人走过的小路,跟荒山不一样。我们推测是当年修建和维护长城时古人走的路。”

作为把大半生都献给了长城的古建专家,孟琦最看重的,是这些古建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后人讲述有关它的故事。而此次喜峰口修缮将以排险为主,本着最小干预原则,不做过度修缮,保留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雄关险要、风景奇秀、独一无二、原汁原味等特点。

“就是希望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的历史细节信息,给通过这里认知长城的今人和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触手可及的历史。”孟琦说。

长城是一生奉献的事业

用脚步丈量

2020年8月24日,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河北境内现存有战国、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代等不同时期长城,行经9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其中河北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怀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总长1338.63千米,长城墙体共1153段,包括单体建筑5388座、关堡302座、相关遗存156处……”

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一连串的数字时,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副会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郭建永似乎并不需要时间去思考——毕竟,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他和同伴们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2006年2月,涉及全国14个省区市的“长城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然而,工程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长城究竟有多长,都在哪儿,存在和保护的状况究竟如何?摸清长城的“家底儿”、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建立长城文物记录档案,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作为明长城分布里程最长的省份,2006年4月7日,河北率先启动了明代砖结构长城的试点调查。

“我所这一组从秦皇岛的山海关出发,沿着燕山、太行山走下去。整个调查时间在一年半左右,沿着外长城、内长城行走了1000多公里。”郭建永回忆。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基层的长城调查员最是清楚。

2007年5月22日,迁西龙井关。

参与了此次调查的李子春所在调查小队四人分成两组,分别对两段长城进行调查。

“我和一位同事去对龙井关西侧群山中的一段独立长城进行调查,另一组到遵化与迁西交界的洪山口沿长城主线向东调查。”李子春说,当时从地图上看,他们这一组的任务似乎并不难。

可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跟沿途碰上的老乡一打听,要找到那段单体长城,“还需要翻三座山!”李子春暗暗叫苦——由于前一天在野外饮食不当,他和同伴这时都患上了急性肠炎,一路走一路腹痛。

强忍着翻山越岭疾行了一个多小时,总算看到了那段独立的长城墙体和敌楼——这段单体长城全长500米,两端与山险(悬崖)相接,共有三座敌楼,其功能主要是拦截跨山偷袭的敌人。

令人高兴的是,这段长城整体保存还算完好。两个人赶忙抓紧时间进行定位、拍照、记录、测量。

结束了调查工作之后,为尽快与另外一组同事会合,他们决定不再走回头路,而是在墙体北侧另辟蹊径。穿过这段长城墙体和敌楼后,果然发现有条狭窄山路。

山路狭窄而弯曲,茂密的树从将山路覆盖,两人一边走一边拨开枝从寻路前行。而此时,雷声越来越接近,雨也开始穿过峡谷缝隙打在巨石上。

“雨一旦大起来,挂满青苔的山石就

会变得极滑难行。更可怕的是,大雨倾泻于山谷可能形成山洪。”事隔多年,李子春回忆起这一幕,仍禁不住皱紧眉头。

但更险的境况还在后边:走着走着,脚下的路没了,一个悬空的跳崖横在眼前。探身向下望,崖深数十米,下面是个深水潭。

怎么办?进退维谷之际,他们发现长满青苔绿草的岩壁上,似有几个脚坑隐约向上延伸,一路向东而去——过去一定有人在此处攀岩上山。

“这是今天唯一的出路了。”两人下定决心,重整行装,束紧腰带、系好鞋带,循着那几个隐约的脚坑开始了绝壁攀登。

突然,李子春脚下——岩石被踩落,顿时身体悬空、下滑,他在忙乱中两手本能地顺势一抓,一把攥住树根,右脚死死蹬住了崖缝,稳住了身体。

石块翻滚而下,“咚”的一声滚至谷底。李子春头发直竖:“好悬!五十岁的老命差点搭这儿!”

前途比他们想象的更糟糕,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又出现了两个悬空跳崖。两人用同样的攀岩方法,艰难寻找适合手脚蹬、爬、抓的位置,挑战体能极限,终于在大雨降临前看到了山谷出口。

三年多的时间,河北长城资源调查队的25名队员,就这样横跨全省8个地市,行程89579公里,徒步近20000公里,调查登记敌台2049座,烽燧2665座,马面637座,城堡302座……为长城河北段的保护工作留下了第一手的详实资料。

用一生阅读

1984年5月4日,秦皇岛。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下到凌晨。整整一夜,时年27岁的董耀会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

不到5点,妻子就已经起来做饭了。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早早赶来为他送行。可董耀会还是在床上赖了半天——这一天起,他将暂时告别这张床,“说暂时也要至少两年”。

“现在只记得送行的饭桌上有一盘花生米、几根黄瓜,还有西红柿、两瓶白酒。大家只是喝酒,很少说话。”董耀会至今记得,妻子煮熟饺子时已经快7点了,而出发时间定在7点半。“离开母亲,离开老婆孩子的那一刻,我不敢和她们目光相对,我不知道自己走了之后,她们的日子怎么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她们面前。”

这一天,青年工人董耀会和吴德玉从山海关老龙头出发,开始自费徒步考察明长城。两个月后,东北青年张元华在北京的平谷追上他们,加入了队伍。

1985年9月24日,他们一起攀登抵达嘉峪关城楼。

三人又于当年10月20日从辽宁丹东出发,12月28日到达山海关,徒步考察了明辽东镇长城,最终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全部旅程。

2020年9月18日,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已经成为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的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受邀为学院的师生们做一次演讲。

“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必须是中国人。”谈及当年走长城的初衷,董耀会说,彼时正值改革开

放初期,社会上涌动着要开创一番事业的激情与梦想。1981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杨联康用315天时间徒步考察黄河,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听说有几个外国人计划走长城,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当时除八达岭等少数几个得到修缮开放的景点之外,绝大部分长城的资料是匮乏的,还没有人从头到尾完整地走一遍做过考察。从山海关动身,董耀会他们每天各自背着20多斤的设备和资料,天一亮就出发,日落前下山,晚上就住在长城附近的村子里。

“无论走到哪,当地的人听说我们是第一个徒步走长城的,都会主动给我们提供无私的帮助。”董耀会记得,有一回,他们请一个放羊的老汉带路,并想给他点钱作为报酬,老汉却说,你们要是看长城我就带你们去,要是给钱我就不管了。

这一次行走改变了董耀会的人生轨迹。

“从出发的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城。”考察归来,董耀会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并在其后的36年里,一直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写作,致力于为长城的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奔走。

1998年、2002年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访华期间参观长城,作为国家指定专家全程陪同讲解的,正是董耀会。

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长城学会,参与研究《长城保护条例》,倡议成立长城保护基金会,与多所大学联合成立长城研究院,到社会各界、大中小学举办长城文化讲座……最近,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工作陆续展开,董耀会也在积极参与。

“长城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讲座上有学生提问。

“长城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一次行走只是翻开了这本书的扉页,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等着我和一代一代的长城人去挖掘和研究。”

壮年时曾把长城比作“老父亲”的董耀会,现在开始忙着向年轻人讲述长城。2020年,他参与了万里长城保护计划公益纪录片《筑魂华夏》的制作,并与用户群体主要为年轻人的B站进行了合作。

“长城的保护不是我们一群人、一代人的事情,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新颖的形式把保护长城这样一件文物部门一家的事情变成每个中国人自己的事。”董耀会解释,“要让‘90后’‘00后’的年轻人主动亲近长城文化,体悟长城精神,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图腾的保护工作中来。”

董耀会注意到,2021年3月3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通过《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

在他看来,条例的出台为加强长城保护利用、阐释长城价值、弘扬长城精神,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解决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

用双手守护

2020年12月18日,秦皇岛城子峪长城。

雪后的长城上人迹罕至,山路上只留下一串奇怪的山时留下的脚印。那是65岁的张鹤珊拄着一根自制的拐棍巡山时留下的。

脚踏胶鞋,左手镰刀,右手编织袋,拾捡起游客丢弃的塑料水瓶,劝阻年轻人乱写乱画,给游客讲关于长城的民间传说……这是秦皇岛海港区驻操营镇城子峪村长城保护员张鹤珊的生活常态,即便大雪封山也是如此。

从1978年起,张鹤珊巡护村子附近的明长城已经40多年了。

因为守长城,从城子峪到平顶岭10公里长的长城沿线,老张几乎每天都要走上一两趟。40多年里,光爬山的胶鞋,他就穿坏了200多双。其间的每座山包,每条小路以至长城的每座城楼每个门洞,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因为守长城,他张成中国长城学会的第一位农民会员,边保护边研究长城,他写下的笔记,放在地上有一摞子,七八十厘米高,还整理出了20多万字的长城考察笔记和故事传说。

秦皇岛市是较早试点长城保护员的地区。

15年前,城子峪村当时所属的抚宁县就成立了长城保护员队伍,制定责任制和年终考核制度,采取定地段、定专人、定责任、定补贴、定奖惩的“五定”模式运行。张鹤珊就是首批受聘的18位长城保护员之一。

“秦皇岛长城以雄奇险秀著称,但即使这样,仍有很多点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很难带来直观经济效益。”秦皇岛市旅游文广局文物负责人马猛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引入长城保护员等社会力量势在必行,也可缓解基层文物工作者匮乏的问题。

2018年9月,秦皇岛市制定长城保护条例,完善了长城保护员管理机制,为长城保护员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明确补助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今,秦皇岛市有258名长城保护员日夜守护境内的223公里长城。有些长城段落成了景区,村民们办起农家乐享受到长城保护的红利,也自发成为义务保护员。”马猛说。

相比于张鹤珊那一代人,秦皇岛“80后”张鹏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长城保护员的2.0版。

迷彩服、变色镜、GPS、专业户外装备、无人机……33岁的张鹏向记者展示,“咋样,咱这身装备



豪横不?”

2017年,山海关区文物局吸纳长城爱好者张鹏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干个体经营的张鹏花了1万多元,用一个月时间考取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又购置了一架小型民用航拍无人机。

出山海关关城,东北方向8公里外,有一处“倒挂”胜景,名三道关。

古人在两山对峙的峭壁峡谷间设关三重:第一道设在河口,依山傍崖,锁钥若瓶;第二道悬于绝壁,险峻异常,高耸入云;第三道龙盘岭腰,巨石高筑,劈山截谷。站在河口仰望,三道石砌长城如游龙巨蟒从崖顶逶迤而下,直插谷底,又依山背奔腾而上。

但这样坡度接近75°的段落,也给人工巡护出了难题。“无人机优势在于能对长城进行全方位拍摄观察。”说话间,无人机腾空而起,往三道关上空飞驰而去,片刻后便传回清晰的影像。

目前,张鹏和队员摸索了一整套报备、巡查、监督、反馈体系。他们拍照上传的长城建筑开裂等隐患信息,成为有关部门开展长城保护的参考。

“这是巡视状态记录软件,记录长城保护巡查人员的线路轨迹,分析路程路况……”张鹏拿出手机向记者演示。

针对传统长城保护员单独进入山林的风险,张鹏他们将巡视状态记录软件与GPS定位功能相结合,这样文管工作人员就能够在办公室实时监控保护员所处位置。

张鹏现在是山海关区长城保护员团队的队长,他的团队目前有10人,以“85后”为主。

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从众多优秀长城保护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大学老师,也有民间长城专家等。

“虽然都是兼职,但是大家热情很高,综合素质非常优秀。现在报名的排着长队,以至于我们初选时先问是不是党员。”张鹏说。

除了运用新技术力量无人机进行巡护,队员们还要结合大数据、专业应用软件等,更好地服务长城保护和宣传长城工作。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长城保护员2.0版’的团队,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年轻化、知识化、科技化和专业化。”郭颖说,这是符合现在长城保护需求,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感谢河北省文物局、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张家口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赤城县博物馆、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中国长城学会、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协助)